

合法性研究: 中西方学界看法为何如此不同?

曾敬涵

内容提要: 政治合法性一直是中西方学界研究的热点话题。文章致力于研究国内学者如何看待合法性议题,并用以和海外学界的观点作对比。基于125篇发表于2008年至2012年以合法性为题的中文文章,文章揭示了中西方学界在合法性议题上的一系列巨大分歧。首先,相比西方学者而言,国内学者更加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其次,国内学者对政绩合法性尤其是经济增长更加悲观。另外,国内学者的合法性探索完全是基于西方理论而非中国传统哲学,同时也呈现出自由化(社会自治)的倾向。文章还发现,国内学者的观点和研究背景(地点、机构以及研究经费)有所关联。改变的社会价值观、社会不平等以及腐败是国内学者最常提及的合法性威胁,而意识形态、社会公正以及管治能力被认为是维持合法性的最优解决方案。

关键词: 合法性 海外学界 经济增长 政府治理

中图分类号: D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947(2014)05-0108-10

一、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各种跨国调查包括世界价值调查和亚洲民主动态调查都显示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广受民众支持(Chen 2004; Gilley 2006、2008; Li 2004; Shi 2001; Tang 2005; Lewis-Beck et al., 2013)。海外学界普遍认为,政绩尤其是经济增长是合法性的主要(甚至唯一)来源(Zhao 2009; Wang 2005b; Laliberteé & Lanteigne 2008; Shambaugh 2001; Perry 2008; Wang 2005a)。与此同时,海外学界还普遍认为,在市场化改革的驱动下,意识形态已经变得不再重要(甚至是过时)了(Misra, 1998; Lynch, 1999; Ramo 2004; Dreyer 2012)。国内学者如何看待合法性的问题?他们是否赞同海外同僚的看法?本文致力于研究国内学者如何看待合法性议题,并用来和西方学界的观点作对比。

在吉利(Gilley)和霍尔比格(Holbig 2009)开创性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系统性地分析了中国学界围绕合法性这一议题的争论。通过研究125篇发表于2008~2012年间以合

作者简介: 曾敬涵,英国德蒙特福大学政治和公共政策系讲师。

本文主要内容基于 Jinghan Zeng 2014. "The Debate on Regime Legitimacy in China: Bridging the Wide Gulf between Western and Chinese Scholarship."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3(88). 编码手册、数据库、网上附录以及其他相关资料请见作者的研究主页 <https://sites.google.com/site/zengjinghan/data>。

法性为题的中文文章。本文揭示了中西学界在合法性议题上的一系列巨大分歧。本文在几个重要的地方有别于之前吉利和霍尔比格的研究。

第一, 本文系统地分析了中西方理论在国内合法性论述中的影响。当许多海外学者试图从中国哲学思维来理解合法性的时候(Shue, 2002、2004; Tong, 2011; Guo, 2003; Schneider & Hwang, 2014; Zhao, 2009) 本文发现相关领域的国内学者却专注于西方哲学理论。也就是说, 国内学者的合法性探索几乎完全是基于西方哲学理论而非中国哲学思维。这和中国模式以及中国例外论所倡导的观点——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让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不同于西方政权——似乎有所冲突。

第二, 除了研究合法性这个议题以外, 本文也检视了相关学者的观点是否受到研究背景的影响。本文发现政府研究经费支持的项目更倾向于提倡改善公共福利。研究机构在富裕地区的学者更少担心贫富不均、经济增长可持续性、腐败以及政治参与度不足等问题。而研究机构在相对贫瘠地区的学者则倾向于提倡改善政府效率和透明度, 增强公民参与, 鼓励出台社会发展政策。另外, 党校系统的学者则对党内民主更有兴趣。

第三, 吉利和霍尔比格(Gilley & Holbig, 2009) 研究的是基于 2003 至 2007 年的相关文献, 而本文是基于更新的数据(2008 ~ 2012 年) 因此, 可以分析最新重大事件对合法性探讨的影响, 比如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就在海外各界高度赞许我国政府应对 2008 年金融危机措施的同时(Naughton, 2009; Ross, 2012; Holbig, 2011; IMF, 2010) 本文发现国内学者却因该危机对合法性更加悲观。

另外, 与五年前相比, 现在中国学界探讨合法性焦点和研究议程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 2003 ~ 2007 年的探讨中, 改变的社会价值观、变化中的利益结构、即将耗尽的革命历史合法性被认为是对合法性最具威胁的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已经被对社会贫富不均、腐败和官僚体制低效等的担忧所取代, 尽管改变的社会价值观还是被认为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而社会贫富不均和腐败都是高速增长所滋生的一系列问题。

随着问题的改变, 相应的政策建议也有所变化。五年前最常被提及的建议依次是促进法治, 促进更持续高速增长, 加强舆论引导, 以及建立更加高效的党组织, 而现今的次序则是改善官僚体制(回应性、透明、高效) 加强舆论引导, 促进法治, 促进社会经济平等。最后通过主成分分析, 本文将国内学者提出的政策建议归纳为意识形态、社会公正以及管治能力三组。

二、研究方法

为了系统性地研究相关的中文文献, 我设计了一个编码手册并对 125 篇中文文章进行编码^①。编码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 作者如何看待合法性程度的高低?
- 作者认为合法性有哪些问题?
- 作者提出了哪些维持合法性的建议?

^① 相关数据信息请见我的研究主页 <https://sites.google.com/site/zengjinghan/data>。

●文章提及和引用了哪些学者的研究和看法?

以上 125 篇文章全部选自中国知网。在中国知网里,所有以“合法性”为题目并发表于 2008 ~ 2012 年间的学术文章都被选入我的数据库^①。

三、研究局限性

由于中国知网数据库的原因,我的研究无法包含异议人士以及政府内部文件的看法。另外,这个数据库也不包括书籍,但相关书籍的观点也会以文章的形式呈现(虽然涉及二手资料)。最后一个是海外学界普遍担忧的学术自由度的问题。虽然国内的学术探讨有很多限制,但本文揭示出一个非常公开多元化的学术探讨,其中包括不少和官方立场不一致的观点。

四、选取文章的组成以及作者背景

在选取的 125 篇文章中,17% 是政府资助项目^②。我发现政府资助的项目更倾向于提出增进公共福利来维持合法性^③。这和政府加强民生建设的倾向一致。另外,作者研究机构所在的地理位置和他们的观点也有某种程度的关联^④。研究机构在更富裕地区的学者更少担心贫富不均^⑤、经济可持续发展^⑥、腐败^⑦以及公民政治参与度不足^⑧等问题。研究机构在更贫瘠地区的学者倾向于建议提高政府效率和透明度^⑨、增进公民参与^⑩,和鼓励社会组织发展^⑪。以上发现都表明中国各个省份多元化的合法性需求和考量。

在我收集的 125 篇文章中,十七个作者来自不同层级的党校,包括中央以及省市级党校。值得注意的是,来自党校系统和政府的学者更多地倾向于推荐党内的民主^⑫。总的来讲,这 125 篇文章有 81.7% 的作者来自大学,13.4% 来自党校系统,2.4% 是政府官员,1.6% 是军队学者。值得注意的是本文中的国内学者主要是指内地的学者,不包括台湾和香港地区或者旅居海外的中国学者。

① 包含从 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9 月 1 日所有研究合法性的文章,但不包括研究某项公共政策、意识形态、公民组织,或者其他政党合法性的文章。

② 包括从各种政府组织(如教育部)以及一些大型国家基金会(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获得的项目。

③ $[X^2(1, N = 123) = 6.395, p < 0.05]$

④ 自变量为作者所在单位省份 2009 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关于为何我没有使用“省市一年份”为单位的面板数据的原因在网上附录中有解释。样本量为 123,因为有两篇文章没有计算在内,一篇是匿名,一篇是英文译文。在两个或者更多作者的情况时则参照第一作者背景。

⑤ 社会经济不均,以及区域不均等, $[r = -0.345, n = 123, p = 0.000]$

⑥ $[r = -0.245, n = 123, p = 0.006]$

⑦ $[r = -0.200, n = 123, p = 0.027]$

⑧ $[r = -0.213, n = 123, p = 0.018]$

⑨ $[r = -0.179, n = 123, p = 0.0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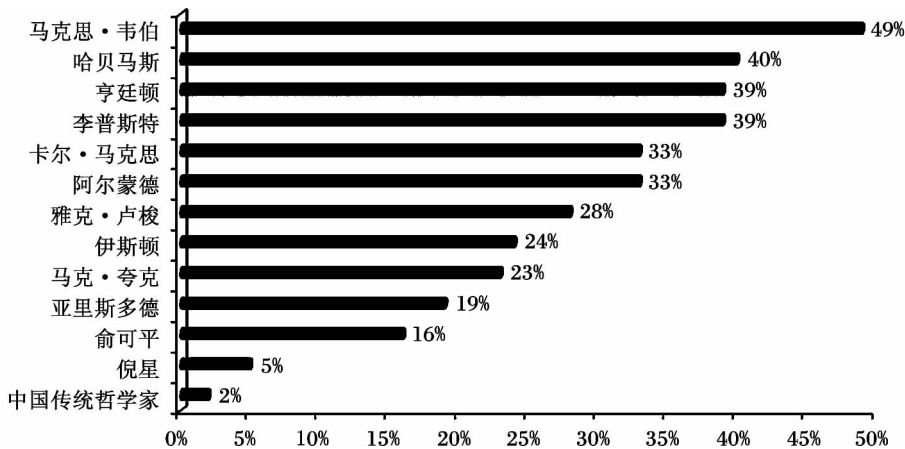
⑩ $[r = -0.228, n = 123, p = 0.011]$

⑪ $[r = -0.194, n = 123, p = 0.031]$

⑫ $[X^2(1, N = 125) = 7.995, p < .01]$

五、学者引用率

图 1 显示了学者引用率。在国内的合法性探讨中,只有 2% 的文章提及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相比之下,19% 的文章提及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这个结果和中国模式以及中国例外论提倡的看法恰恰相反。许多人经常用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来解释为何中国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与西方政权完全不同。一种普遍的看法是西方合法性理论强调民主、人权、公平正义和法治,而中国传统执政哲学则强调天命、仁君(德治)、民生以及和谐等概念。就在越来越多海外学者也开始在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来解释合法性的时候(Shue 2002、2004; Zhao, 2009; Tong, 2011; Guo, 2003),国内的合法性探讨却完全受到西方哲学理论的影响。



数据来源: 改编自本文英文版本。

图 1: 中文文献合法性探讨中的学者引用率 (2008 ~ 2012 年)

这个结果表明,中国模式的提倡者还没有完全说服国内的同行。实际上西方理论在国内的政治学研究中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的传统哲学理论还没有完全现代化,因此,还不能够提供一个更具说服力的话语体系来取代成熟的西方理论。尽管西方理论在解释中国的时候有很多问题,但是替代的理论(如果有的话)在解释中国的时候更加糟糕。如同马得勇指出的:

“从传统思想中寻找当代政治的合法性没有什么奇怪的,但我们现在所有学科都源于西方,所以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中国问题是不可避免的。现在没有哪个中国学者能自创一套学术体系让人们广为接受。中国学者能做的或许就是在现有世界学术体系中创立一些能够解释中国现实的新概念和新理论,这就不错了。”^①

如同图 1 表明的那样,不只是古典西方学者,当代西方学者也影响力巨大。国内合法性探讨中最具影响力的都是西方学者: 马克思·韦伯(49%)、哈贝马斯(40%)、亨廷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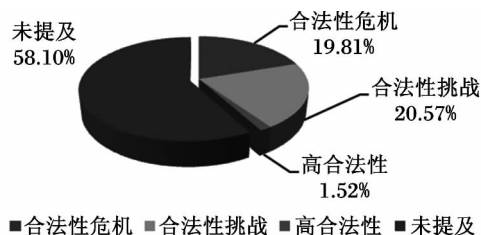
① 来源自我与马得勇的邮件交流。

(39%) 以及李普塞特(39%)。有意思的是,只有 33% 的文章提及共产主义的精神领袖卡尔·马克思,这相比其他西方学者并不突出。在国内合法性探讨中,经验主义合法性比规范主义和批判主义更具影响力,这不仅是因为经验主义代表人物马克思·韦伯和李普塞特更多地被提及,更是因为经验主义合法性可以更加务实地分析合法性问题。韦伯的合法性框架(传统、法理和个人魅力)以及随后的修正版本为国内学者的合法性探讨奠定了理论基础。

另外一个和西方学界完全不同的现象是,尽管国内学者探讨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并且持有不同观点,很少有学者直接回应或者挑战其他学者的看法(而在西方文献中,对其他观点的回应以及挑战几乎是必须的)。这个现象和吉利与霍尔比格(Gilley & Holbig 2009)的研究结论一致。吉利和霍尔比格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学者不愿意被归类为某一个。但值得注意的是,有 16% 的文章提及俞可平“善治”的概念。如同图 1 所示,俞可平同时也是在这个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国内学者。

六、合法性程度

大多数海外学者都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广受支持(Chen et al., 1997; Fewsmith, 2007; Gilley, 2009; Shi, 2001、2008; Tang, 2001; Tong, 2011),这个观点也被各种跨国调查的结果所支持(Chen, 2004; Gilley, 2006、2008; Shi, 2001; Tang, 2005)。用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和台湾大学朱云汉的话来说,“中国政治体制的合法性程度相当高”是“熟悉这个领域的学者”达成的共识(王绍光 2010; Chu, 2013; Wang, 2012)。然而国内学者明显比这个“共识”悲观。如同图 2 所表明的,只有 1.52% 的学者认为,中国体制的合法性高或者相对较高。近 20% 的学者认为,中国体制遇到“合法性危机”,近 21% 的学者认为,中国体制遇到“巨大挑战”、“严峻挑战”、“威胁”或者“合法性匮乏”。为何国内学者如此悲观?这是值得深深思索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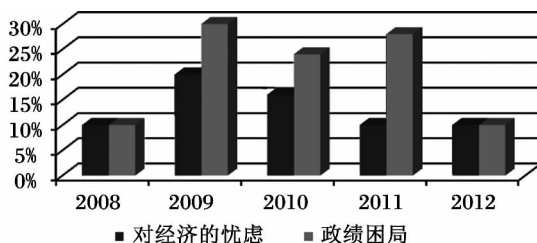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 改编自本文英文版本。

图 2: 国内学者看待合法性高低的程度

七、合法性威胁

在国内学者看来,中国体制合法性的挑战主要来自国内而非国外。14% 的学者提及全球化是合法性下降的原因之一,而只有 5% 认为,“西方敌对势力”应为此负责。另外,13% 的学者对当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表示担忧,同时 21% 的学者认为,中国已经或者即将碰到政绩困局。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各界频频赞许中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得当 (Naughton, 2009; Ross, 2012; Holbig, 2011)。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0 年的报告称,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快速、果断和有效”(IMF, 2010)。然而,如图 3 所示,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国内学者对中国经济可持续性和政绩困局的担忧明显上升。这再次表明国内学者对经济增长是否还能继续维持中国体制的合法性不再乐观。



数据来源: 改编自本文英文版本。

图 3: 2008 ~ 2012 年政绩困局和经济忧虑被提及的频率

另外,如同表 1 所示,近一半的学者认为,社会经济不平等(49%)和改变的价值观(49%)是最常被提及的合法性威胁,随后是腐败(43%)和官僚体制问题(39%)。这个结果与党政领导干部的看法非常一致。根据社会蓝皮书表明,党政领导干部认为,社会经济不平等和腐败是最大的社会问题(汝信、陆学世、李培林, 2008)。有意思的是,这一结果和哈佛教授怀默霆的研究结论相反。怀默霆的研究认为,中国大众不觉得中国社会不平等,他们甚至认为,当前体制是“公正的”(Whyte, 2010)。

最后,在合法性探讨中,国内学者对腐败深恶痛绝。然而,乔治·梅森大学的拉米雷兹(Ramirez, 2012)却认为,这是中国发展阶段的必然问题,美国在中国这个发展阶段时比中国更加腐败。拉米雷兹还乐观地预测,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腐败问题会迎刃而解。信息发展问题也值得关注,不少人认为,网络的发展尤其是社交媒体正在前所未有的改变着中国。不过,只有 5% 的国内学者认为,这对中国体制的合法性构成直接的威胁。

表 1: 中国学者对合法性威胁的看法

变量	频率	注
社会经济不平等	49%	比如: 贫富差距、社会不平等、区域不平等、城乡差距
改变的社会价值观	49%	比如: 主流意识形态边缘化、公民意识抬头、西方价值观入侵
腐败	43%	比如: 权钱交易、腐败
官僚体制(威胁)	39%	比如: 低效、不透明、政府不作为
政治参与度不足	30%	比如: 公民参与度低、非政府组织参与度低
利益矛盾	21%	比如: 在社会阶层、利益团体、利益集团、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
环境污染	14%	比如: 环境污染、人口压力
公共福利不足	13%	比如: 健康教育社会保障、房屋保障、养老保障等
法治不足	13%	比如: 立法质量低、不遵守法律
信息发展	5%	比如: 网络、大众媒体、社交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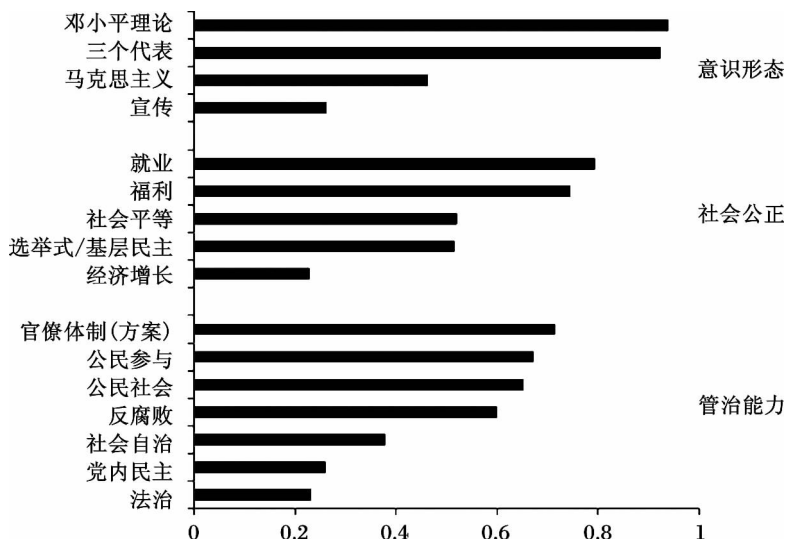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 改编自本文英文版(Zeng 2014)。

八、维持合法性的政策建议

当海外学者频繁用经济成就解释中国体制的合法性的时候,国内学者却对此表示忧虑。他们认为,单靠经济增长已经不再能够维持中国体制的合法性。如同之前提及的,许多学者明确地表达了对经济可持续增长和政绩困局的忧虑。另外,在2003~2007年的合法性探讨中,50%的学者认为促进更好、更快和更加持续的经济增长有助于维持合法性(Gilley & Holbig, 2009),然而现在只有21%的学者还坚持这个观点。许多学者明确地强调政绩合法性的不可持续性以及建立更巩固合法性来源(比如法理合法性)的必要性。可以说,寻找经济增长以外的合法性来源,几乎是国内学界的共识。

为此,国内学者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在2003~2007年的合法性探讨中,最常提及的政策是改善法治(64%),增进经济增长(50%),发展民主(50%),加强宣传(48%)。而现在,最常提及的政策依次是改善官僚体制(46%,五年前是25%),加强宣传和舆论引导(38%),增强政治参与(37%),培养公民社会(27%,之前是10%)。

为了更好地理解以上各个政策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我的研究还用了主成分分析来研究29个变量。这些政策可以归纳为三组:意识形态、社会公正、管治能力,如图4所示。



数据来源:改编自本文英文版。

图4: 三组维持合法性的政策建议(因子相关性 r)

根据因素分析的结果,英文原文用定性分析法研究了具体的政策建议,由于篇幅等原因不在此详述,更多内容请见英文原文(Zeng, 2014)。

九、结论

本文分析了2008~2012年国内学者的合法性探索,并用以和海外学界的观点作对比。几个重要的结论值得注意。第一,当海外学界更多地关注于用中国传统历史哲学来

解释政治合法性时,国内学者却专注于西方哲学理论。这说明中国模式以及中国例外论还未完全说服国内同行。相应地,国内合法性探讨也呈现倾向于支持社会自治。第二,当海外学者普遍用政绩合法性来解释合法性并且认为意识形态已经过时,而国内学者却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同时也对政绩合法性的作用感到悲观。第三,当海外学者频频赞许中国成功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时,国内学界变得更加悲观。第四,国内学者的观点和他们的研究背景有所关联。这些关联是否适用于其他领域值得关注。

最重要的是,在各种经济增长衍生问题的驱动下,当前合法性的探讨已经和五年前完全不同。国内学者明确地指出单靠经济增长已经不能维持合法性,他们同时也清楚不好的经济表现会削弱合法性。

总的来说,本文揭示了中西方学界在合法性议题上的一系列巨大分歧。这些分歧也许和不同的研究视角有所关联。海外学界看待中国问题更多的是从外部视角整体性看待中国问题,因此也更能够用比较的眼光分析中国问题(比如更多地将一些中国问题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更能理解哪些是发展中国家所必然遇到的问题)。而国内学者更多地从内部看中国问题,更加了解实际发生的状况,因此能更深入地了解、透视某些无法从外界感受的问题。

参考文献:

- 汝信、陆学世、李培林 2008 《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王绍光 2010 “‘王道政治’是个好东西”,《开放时代》2010 9。
- Chen, J., 2004. *Popular Political Support in Urban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en, J., Y. Zhong, J. Hillard and J. Scheb, 1997. “Assessing Political Support in China: Citizens’ Evaluations of Governmental Effectiveness and Legitimac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6: 551 – 66.
- Chu, Y. H., 2013. “Sources of Regime Legitimacy and the Debate over the Chinese Model.” *China Review*. 13: 1 – 42.
- Dreyer, J. T., 2012.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Modernization and Tradition*. Boston, MA: Longman.
- Fewsmith, J., 2007. “Assessing Social Stability on the Eve of the 17th Party Congress.”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12: 1 – 10.
- Gilley, B., 2006. “The Meaning and Measure of State Legitimacy: Results for 72 Countr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45: 499 – 525.
- 2008. “Legitimac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1: 259 – 84.
- 2009. *The Right to Rule: How States Win and Lose Legitima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Gilley, B. and H. Holbig, 2009. “The Debate on Party Legitimacy in China: A Mixed Quantitative/Qualitative Analysi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8: 339 – 58.
- Guo, B., 2003. “Political Legitimacy and China’s Transition.”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8.
- Holbig, H., 2011.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Legitimacy: Reflections on Western Theories 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16: 161 – 81.
- IMF, 2010.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0 Article IV Consultation – Staff Report; Staff Statement; Public Information Notice on the Executive Board Discussion.” www.imf.org/external/pubs/ft/scr/2010/

er10238. pdf.

Laliberté, A. and M. Lanteigne, eds., 2008. *The Chinese Party – State in the 21st Century: Adaptation and the Reinvention of Legitimacy*. London: Routledge.

Lewis – Beck, M. S., W. Tang and N. F. Martini, 2013. “A Chinese Popularity Function: Sources of Government Support.”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December 2013.

Li, L., 2004. “Political Trust in Rural China.” *Modern China*. 30: 228 – 58.

Lynch, D., 1999. *After the Propaganda State: Media, Politics, and “Thought Work” in Reformed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Misra, K., 1998. *From Post – Maoism to Post – Marxism: The Erosion of Official Ideology in Deng’s China*. London: Routledge.

Naughton, B., 2009. “China’s Emergence from Economic Crisis.”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29.

Perry, E., 2008. “Chinese Conceptions of ‘Rights’: From Mencius to Mao and Now.”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6: 137 – 47.

Ramirez, C., 2012. “Is Corruption in China ‘Out of Control’? A Comparison with the U. 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Ramo, J. C., 2004. *The Beijing Consensus: Notes on the New Physics of Chinese Power*. London: Foreign Policy Centre.

Ross, J., 2012. “China’s Economic Success Set an Example the World Should Follow.” *The Guardian*.

Schneider, F. and Y. J. Hwang, 2014. “The Sichuan Earthquake and the Heavenly Mandate: Legitimizing Chinese Rule through Disaster Discours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3.

Shambaugh, D., 2001. “The Dynamics of Elite Politics during the Jiang Era.” *The China Journal*. 45: 101 – 11.

Shi, T., 2001. “Cultu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Trust: A Comparis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 *Comparative Politics*. 33: 401 – 19.

———2008. “China: Democratic Values Supporting an Authoritarian System.” in Y. H. Chu, L. Diamond, A. Nathan and D. Shin eds. *How East Asian View Democra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Shue, V., 2002. “Global Imaginings, the State’s Quest for Hegemony, and the Pursuit of Phantom Freedom.” in K. Kinvall and K. Jonsson eds. *Global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in Asia*. London: Routledge.

———2004. “Legitimacy Crisis in China?” in P. Gries and S. Rosen eds. *State and Society in 21st Century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Tang, W., 2001. “Political and Social Trends in the Post – Deng Urban China: Crisis or Stability.” *The China Quarterly*. 168: 890 – 909.

———2005. *Public Opin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Tong, Y., 2011. “Morality, Benevolence, and Responsibility: Regime Legitimacy in China from the Past to the Present.”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16: 141 – 59.

Wang, S., 2012. “Is Kingly Governance a Good Thing? An Assessment of Confucian Constitutionalism.” in D. Bell and R. Fan eds. *A Confucian Constitutional Order: How China’s Ancient Past Can Shape Its Political Fu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ang, Z., 2005a. “Before the Emergence of Critical Citize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Trust in Chin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y*. 15: 155 – 71.

———2005b. “Political Trust in China: Forms and Causes.” in L. White ed. *Legitimacy: Ambiguities of*

Political Success or Failure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World Scientific Pub Co Inc.

Whyte, M. K., 2010. *Myth of the Social Volcano*.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Zeng, J., 2014. "Bridging the Wide Gulf between Western and Chinese Scholarship: the Debate on Regime Legitimacy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3.

Zhao, D., 2009. "The Mandate of Heaven and Performance Legitimation in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China."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3: 416 - 33.

Legitimacy: Why do 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 Think So Differently

Zeng Jinghan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 at the De Montfort University)

Abstract: Legitimacy is a core topic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and has been widely studied by 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views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on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China, and juxtaposes these with that of Western scholarship. This article also analyses why Chinese scholars think differently from Western scholars on the issue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China.

Key words: Legitimacy; International Scholars; Economic Growth; Governance

(责任编辑: 郜继红)